

死亡,技术时代中的一款非标准商品

◎唐山

格丽塔·阿德勒是美国的一位85岁老人,她被送进医院时,理由是“营养不良”和“生长停滞”。后者听上去像黑色幽默,但没办法,现代医学不承认“自然死亡”,人们过去说的“老死了”,如今得具体表述为心脏衰竭、肾衰竭之类。于是,濒临死亡就成了“生长停滞”。

在医院,老人对医生说:“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想象我的葬礼。”经过28天的“治疗”后,老人被送到护理院,人人都知道结果是什么——两周后,她去世了。

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中,阿德勒痛不欲生,但她无权放弃治疗;医生明知无效,却必须遵守行业准则,表演一下什么是全力以赴;阿德勒的儿子收到一张巨额账单,他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但他不懂医,不知怎么判断;美国政府也为此支出了一大笔公共开支……

在美国,一生医疗总费用的30%用于生命最后一年,其中40%用于最后一个月,宝贵的医疗资源就这么被浪费掉。

大多数现代人会死在医院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死亡”这个概念正由医院塑造,并成为一种商品,每个人都将成为这款非标准商品的消费者。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人对日渐昂贵的“死亡”感到愤怒,相关讨论至今还未取得共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该议题也会引起更多中国人的关注。美国人类学家莎伦·考夫曼的这本书《生死有时: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堪称一次“预热”。

“拖时间”也成了医学的责任之一

死亡是什么?仅仅在两代之前,死亡对大多数人意味着:躺在自己家中,慢慢逝去,一般情况下,死亡原因不明,只被描述为“他活到岁数了”“他福享尽了”。今天则不同,超50%的美国人死在医院。根据传说,在临终前,他们会得到最好的抢救,以及最舒适的照料。

ICU(重症监护室)正成为新的生死之门,对患者家属而言,明知无望,但只要把患者送入其中,就会在道德上得到安慰,这意味着“我们尽力了”。在美国,ICU也是奢侈品,甚至可达2万美元/天(包含药费、急救费等),清晰地标出了“尽力”的价格。

奇妙的是,ICU确实可以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保证其血压稳定和心脏跳动,至少在法律意义上说,患者没“死”。

在法国,有一名叫朗贝尔的人,2008年因摩托车事故成为植物人,依靠ICU,他又整整“活”了11年。去年,他的家人终于同意“拔管子”,但12小时后,法院判定其家人的同意无效,于是,管子又被插了回去。直到今天,朗贝尔仍“活”在人间。

朗贝尔的“活”,意味着医疗资源的惊人浪费,也意味着剥夺了其他人活下去的机会。其实,朗贝尔绝非个案,世界各国都有一些类似的极端案例。这让人们意识到:现代医学刷新了“死亡”的定义,在它的干预下,“死亡”可以被延缓。

医学在高速发展,未来肯定会出现更多的办法,那么,今天导致死亡的原因,明天可能就不再成立。于是,“拖时间”也成了医学的责任之一,人人都对“拖到技术足够进步的那一天”有期待,而“死亡必然到来”这一事实,便被有组织地掩盖了起来。

死亡是现代社会的“房间里的大象”

在医院,几乎所有医生都讳言死亡,不愿回答“还能活多久”之类的问题。因为除了一遍遍检查,根据检查结果“规范操作”,医生已没有太多发挥空间。所谓负责的医生,就是推荐患者做更多检查的医生。而依据这套“标准流程”,“死亡”并不存在。

本书作者考夫曼跟踪了20多个被送进医院的老年患者,他们的结果都是死亡,可让考夫曼吃惊的是,医生、护士从没谈论过患者是否会死亡,考夫曼还参加了医生的会诊、小组会,也没人讨论过死亡。讨论的一般结果是:再做更多的检查。

不只是医生不提死亡,现代人平时也不讨论死亡,于是,死亡成了“房间里的大象”。在医院、急救中心、火葬场、葬礼服务中心的联手遮蔽下,死亡成了生活中的“意外事件”。得知亲友死亡时,人们的震惊往往比悲伤更多。

绝大多数人是在无知状态下走向死亡的,他们想不到,最后阶段竟会这么痛苦。就像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阿德勒那样,只能靠吗啡来维持,任何人碰她一下,都会让她痛得大声尖叫。她无法配合治疗,甚至无法翻身。

死亡是现代社会的“皇帝的新装”,只有患者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患者的意见常被忽略。结果是,现代医疗设备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体贴,可从结果看,它既没挽救患者生命,也没减少患者痛苦,只是消耗了更多的金钱。

屏蔽死亡,已成为制度与文化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姑息治疗、临终关怀等逐渐兴起,在今天,美国所有大医



院都可提供类似服务,这被称为“有尊严的死亡”,但影响有限。因为屏蔽“死亡”(包括“有尊严的死亡”)的,是现代医疗制度与现代医疗文化。

大多数医生从学医第一天起,便被灌输:此生的最大义务是“拯救生命”。这已成为他们的下意识。从统计看,除非患者及家属提前声明,当患者濒临死亡时,大多数医生会强行实施心肺复苏术——这可能导致患者骨折,且电击也很痛苦。如果无效,接下来的将是气管切开术,大概20%的患者可能得救,代价是每呼吸一口气,都犹如刀割。

让人怀疑:这些抢救究竟是为了挽救生命呢,还是为了医生个人的职业荣誉?

考夫曼发现,当医生认为患者无法挺过手术并发症时,他们根本不会把患者送上手术台,以维持“手术零失败”的荣誉。同样,患者被送入ICU一段时间后,又会以医疗资源紧张为名,将他们送回普通病房。所以,急救永远是成功的,可惜患者自己没挺过去。

无法手术,乃至被送出ICU,患者往往

不知道背后的原因,以为治疗在继续。其实,医生正在等待患者的死亡,除了给予安慰性药物,什么治疗也没有。

在医院中,许多年迈的患者哀求得到止痛药,但医生担心掩盖病情,影响“拯救生命”,往往无视,但护士们会偷偷给他们打止痛针。可在现代医学制度设计中,护士是最底层。每当要节省公共医疗开支时,就意味着大量护士失业。

医生也无可奈何

不应责难医生,他们可选择的空间大小,已被改造成反理性、反人性的“死亡问题”中的一环。现代人一想到医院,就认为医生应懂得所有相关知识。可医学有太多未知领域,医生并不了解一切。

任何一种产品,只有“可预期”,才能成为商品,而死亡是不可预期的。患者自己、患者家人,乃至医生,都只能依靠经验下判断,必然舛错极多。

然而,法律却自欺欺人地认为:死亡可以预期。在此基础上,试图创造一个可掌控的机制:1990年,美国通过了《患者自决法案》,按此法案,医生必须告知患者有选择治疗的权利。

于是,医生必须准备两套以上的方案,供患者或患者家属选择。可后者并非专业人士,他们不知道急救的痛苦,不知道死亡不可避免。据考夫曼观察,只需很少暗示,就能让家属接受医生想要的选择。

《患者自决法案》加大了医生的风险,当患者家属不愿接受结果时,就会指责医生“误导”,为规避这一风险,医生在提出选项时,常给出成功率,不过,很多是随口编造的。

在法律压力下,医生在治疗中更愿采取标准的方案,任何跳出常规的做法,都要征得不懂医的家属同意。其结果是,很多患者就这样按标准流程而“死亡”了。

除了资本,人人都是输家

“死生有命”,这是古人经常发出的感慨,但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给人们以“掌控一切”的幻觉,导致死亡也被打上“遗憾”“失误”“可惜”等标签。

不论怎么掩盖,人总是要死的。在无用的表演中,医生、患者、患者家属、公众利益其实都输了,唯一的赢家是资本。

资本转化成越来越昂贵的药品、医院和医疗设备,它们不断制造出“延长寿命”“救命必备”等幻象,鼓励人们从做X光透视,到做CT,再到CT+核磁共振,再到每年做2次CT+核磁共振……随着消费增加,资本得到了足够的回馈。连充满不确定性的死亡,也被资本改造成自利的工具。

这种自我回馈的闭环掌控了所有人——医生、护士、患者、患者家属,他们被分别定义为消费者、维护者、原材料……医疗的本来目的是让人舒适,如今却被异化成对抗死亡。

“我们对于人类生命自然状态的理解,包括我们对疾病、衰老以及死亡的反应方式一直在被改造着。”本书作者考夫曼相信,通过争论与反思,社会将觉醒,从而主动对抗“改造”。可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情况究竟改变了多少?在与资本的博弈中,社会常常是失败的一方。

《生死有时:美国医院如何形塑死亡》描述的是美国医疗体系的弊端,但也折射出现代医疗制度、观念、文化、法律环境的种种弊端。随着中国社会不断进步,“死亡问题”也会逐渐浮现出来。究竟是去接受更痛苦、更昂贵的死亡,还是让死亡回归自然,避免它被资本过度征用?这就要通过别人的经验去学习,则本书堪称必读书。



读书可以雪恨,他做到了

◎李瑾

丁亥(1647)五月十四日,清廷“非正式钦犯”、前朝国子监生侯岐曾因隐逸义士陈子龙在松江被杀,他写了近一年半的日记也于被捕前一天戛然而止。

三个月前即正月二十九日,这位嘉定文人纸笔对话时曾说:“予对侄云:吾之寓意书籍,非独销愁,实以雪恨,此胜白送日子几倍耶!”《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的作者周绚隆将这句私人独语概括为“读书雪恨”四字,虽未专章就此问题铺陈敷衍,但侯岐曾精神世界中的恨和愁已全然成为周绚隆解读易代之际士人心路的全部基础。

明清易代之际,横扫关内的满清在民风素称“柔脆”的烟雨江南推行“剃发令”时,遭到了袖手谈心性的士人规模空前的抵抗,学者赵园对这一奋争极为看重,认为“明清之际这一台史家所乐道的大戏,是赖江左大夫的出色表演,才能有其持久魅力的”。以往的研究中,士人的抵抗被格式化、样板化了,某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已被慷慨悲歌的评价指代,进而成为殉国殉道或王朝政权更迭之下的超人人格。由此,更进一步被抽象为如何处理汉人的优越感和历史记忆、如何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容纳多元民族文化的政治体制等等宏大问题。

显然,周绚隆是赞同这种整体性判断的,但侯岐曾的日记显然颠覆并重新塑造了他的认知。《易代》试图通过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这一“家”的命运去观察“国”变,但出发点却是历史黑洞中鲜活的人物及

其丰富而不忍直视的内心世界。周绚隆切入微观史学的努力是理性的、有意为之的:“依据日记、私人书信、回忆录和诗文作品,来还原和描述侯岐曾家族几代人在明清易代之际的价值选择和人生际遇,并由此观察这段历史的所谓‘过程’,就成了我后来努力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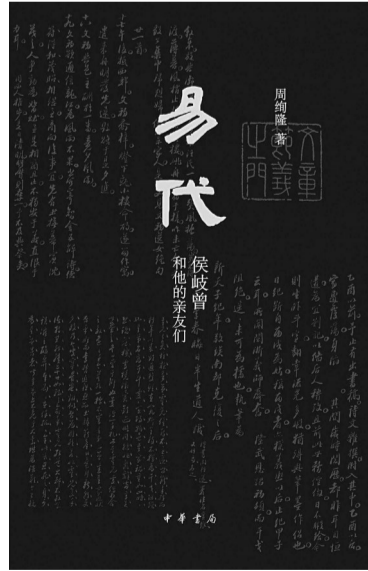
侯氏一家,书香世代。岐曾父震暘,万历三十八进士;他有三子,嗣曾天启五年进士,岷曾未婚早亡,岐曾国子监生。满清入关后的顺治二年,嘉定城破,负责防务的岷曾及其四子中的二人殒身,岐曾奉母及家人远遁避祸。次年正月初一岐曾开始写日记,“以备后人稽考”。第二年因藏匿抗清领袖陈子龙被捕,三日后退难,日记停留在被捕前一天。

值得注意的是,在给清廷的奏报里,侯岐曾甚至连名字都没被提及,“可以说他连正式的案犯都算不上”,然而就是这个非正式“罪人”留下的日记,让我们留意到了宏大的家国叙事中“一直被忽略的家族和他们的世界”。

金兹伯格在《乳酪和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中声称,今天的历史学家“正越来越多地转向了那些被前人之不理的、丢弃的,甚或是完全忽视的问题。”周绚隆以微观史学范式观照侯岐曾及其亲友们,恰恰基于如下两个“被前人之不理的、丢弃的,甚或是完全忽视的问题”:一是士人在国变时究竟有没有一心赴死之愿?一是士人所遭受的究竟哪些是愁哪些是恨?

周绚隆的研究颠覆了我们以往对殉国者的观点,“不论陈子龙还是黄淳耀、侯朝曾等一批烈士,原初并没有殉国的计划,他们的死有着许多未曾预料的原因,特别是陈子龙,他死得很不甘心……夏完淳的诗句‘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其实道破了大多数人的内心纠结。”即便是名满天下的傅山,虽“深自啜恨,以为不如速死之为愈”,更作《不死》诗以示羞惭,不终也苟全其身?

剖析侯岐曾的个人遭遇和心路历程,会发现国破家亡和日常屈辱既泾渭分明又纠葛不清——国破家亡已是既定事实,奔波流离、周转打点是侯岐曾必须面对的生活常态。侯岐曾曾表示,其“生趣已尽,止为待母全孤,留此残生”,但因家本为望族,又和前朝关涉不断,故常如“惊弦之鸟”,不断更换名姓,在“须防耳目”中度日。他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作为前朝忠臣、新朝罪人如何应对避免籍没家产和追缴租税。“他的应对之策是分别行贿督抚和县令,同时打点一些重要的胥吏”,同时,还要应对赤裸裸的“来自各方的敲诈和勒索”。尽管终日周旋,“自籍令一下,惟与菟狐痛哭相对,从此枯骨之肆也。”“钱财用尽,事难挽回”之态一直持续到被捕之日。家庭聚散财富得失之痛甚于夷夏之争新旧之辨,侯岐曾以世家、文人之身饱受新朝、人事之辱,此天然驱使其更念想前代,虽“时时恐蹈危机”,仍思“天下事何不可为耶”,以致包庇陈子



龙,祸及自身,以小配角的身份和夏完淳同日赴难。

侯岐曾日记中有十三处提到“书籍”,其中多是搜集和料理事宜。由此可知,侯氏“寓意书籍”,虽自称“非独销愁,实以雪恨”,但愁和恨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用遣无聊”也好,“销愁”“雪恨”也罢,都可看作是抒怀或志道的代词。侯岐曾在日记自序中称“且前此世务倥偬,日不暇给,今则坐卧斗室,翻幸流光多暇,犹得与笔墨作伴也”,“执笔为新天子纪年,敬俟南都克复之后”,也不仅仅

试图以墨洒胸中块垒。

侯岐曾的“读书雪恨”和吴宓的“学问存国”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吴宓日记中说:“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这种“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的思想和做法,按周绚隆《中国文化的殉道者》一文来看,都是“在为后世留播文化种子”。

在《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前言中,有一语可为“读书雪恨”按语:“时至今日,每次重读这部日记,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他的作者重新恢复了生命,直接和我对话。”旧朝不再,道文犹存,泣血兼无奈,斑斑在目,侯岐曾以书籍销愁雪恨,还真做到了。



下载北京头条App
让现在告诉未来

编辑/于静 美编/田翔 黄校/杨波